



兩名葉門兒童新娘站在她們的丈夫身旁。特哈妮 Tehani (左) 6歲時結婚，她的丈夫瑪傑德 Majed 當時 25 歲。

充分的揭露

史蒂芬妮·辛克萊爾的照片
只是她倡導女孩權利的方法之一



史蒂芬妮·辛克萊爾 Stephanie Sinclair 比 #Me Too 全球女權運動都要領先許多。在 911 事件之後，她想要訴說歷經世界四分五裂卻倖存下來的人的故事。在報導伊拉克及阿富汗戰爭的期間，這位攝影記者得知小女孩被迫結婚的事後，找到她投注熱情的所在。在拍攝這些女孩近 10 年之後，她在 2011 年的《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刊登〈太小不宜婚〉(“Too Young to Wed”) 的報導。2012 年，辛克萊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別名「太小不宜婚」，致力保護女孩的權利，終止童婚的行為。

雖然她其他攝影計畫的行程十分緊湊——拍攝的主題包括印度馬戲團巡迴火車的生活及大象的照顧——她總是會回到有關剝削女孩及年輕女性的報導。她不僅因照片獲獎無數，也募款幫助逃離追捕者的女孩復學、學習新技能，並重拾自尊。

此外，辛克萊爾設立一個基金會，提供獎學金並教導攝影，讓女孩有機會陳述她們的故事，開始改變世界。她的基金會幫助支持及教育她 2017 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備受好評的報導〈兒童，新娘，母親：奈及利亞〉(“Child, Bride, Mother: Nigeria”) 中所拍攝的年輕女性。今年 2 月，其中兩位女孩在美國國會議員及聯合國官員面前分享她們駭人聽聞的故事。

在紐約州皮克斯基爾一個下雪的隆冬午後，兩名子女中有一位還發燒的情況下，辛克萊爾接受本刊撰稿作家茱莉·班恩 Julie Bain 訪談，做了一件她很少做的事：談論她自己的人生、她的攝影理念，以及她如何找到她真正的天職。

英文扶輪月刊：在美國有許許多多關於女性及性騷擾與性虐待的討論。身為一位報導世界其他地方這些議題的人，你對目前發展的看法是什麼？

辛克萊爾：我傾向持樂觀看法，毫無疑問，因為 #Me Too 運動我國正在發生改變。很明顯女

性已經受夠了。每個行業關於應該如何評價女性，已經都在開始進行對話，可是仍然有所限制。現在政治界有許多女性，可是我們需要更多更多女性。能力不是這裡的重點——女性如果願意，沒有理由無法在任何領域的高階職務與男性匹敵。她們最大的阻礙是她們被看待的方式。

我希望我們在我國的進展能擴展至世界上其他女孩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地方。就像今天有人跟我說的：「這就像 #Me Too 運動的十四次方」。我很榮幸自己能夠為這場戰役盡一份力。

我希望我們在我國的進展能擴展至世界上其他女孩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地方。

英文扶輪月刊：現在有更多女性進入新聞攝影這個領域嗎？在妳入行時它仍是偏好男性的行業。

辛克萊爾：有，但它仍然是由男性主宰，可是這無可避免會改變。現在攻讀新聞攝影的女性多於男性，所以我們看到潮流開始改變方向。可是從事某些新聞攝影需要相當大的犧牲。對時間的要求很嚴格，經常出差，這對養育子女來說不算有幫助。

英文扶輪月刊：妳成長於 1970 年代的邁阿密。那對你的視覺創意工作有何啟發？

辛克萊爾：那裡是個成長的好地方，我家經常走出戶外。我母親是一位畫家兼平面設計師，她是個非常視覺傾向的人。我小時候處處都是她生動的畫作，我認為妳可以在我的攝影作品中看到她的風格元素。我不知道該怎麼描述——也許是一種超級寫實主義。關於她的藝術作品總是有想像的成份，她用她自己的方式詮釋她看到的東西。她從我祖母家及我們家族在佛羅里達礁島群的私人島嶼描繪周遭的建築及景

色。我的廚房就掛著一幅她從那座島所繪製的風景畫。

英文扶輪月刊：妳母親在其他方面對妳有何影響？

辛克萊爾：除了是畫家之外，她還是秘書及銀行櫃員。她 30 幾歲時，決定回學校讀書。當她告訴家人她想讀大學時，他們並不支持。我記得她傷心難過他們不支持她想過不一樣的人生，把她在這個世界的經驗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可是她還是去做了。她得到邁阿密大學全額獎學金。她讀書的期間還有份全職的工作，最後她全部科目還都得 A。無疑地，這對我熱中女性及女孩的權利有很大的影響。

英文扶輪月刊：什麼事情引發妳對攝影的興趣？

辛克萊爾：小時候我夏天都到阿拉巴馬州鄉下的祖母家，我 8 或 9 歲時，我舅舅送我第一台相機當聖誕禮物。我非常興奮，認為相機超酷。我開始拍攝我在農場周圍看到的東西，所以我拍了許多牛的照片。

不幸地，我沒有遺傳我母親的藝術細胞。可是當舅舅讓我接觸攝影，我找到了一個表達自我的方法。等我就讀佛羅里達大學時，我算是一頭栽進新聞攝影裡，開始在大學校刊工作。

我母親教導我，如果妳夠努力，萬事皆可能。那有助於我培養自信，到了大學時我渴望嘗試新事物，看見新東西。在學期間，我在《邁阿密論壇報》(Miami Herald)、《亞利桑那共和報》(Arizona Republic)、《聖彼得堡時報》(St. Petersburg Times)、及《底特律自由新



上：8 歲的瑪雅 Maya 和 13 歲的基修爾 Kishore 拍攝結婚照。在印度，儘管法律禁止童婚，可是這個習俗依然存在；下：在奈及利亞被博科哈蘭組織綁架逼婚的 14 歲的達達 Dada，終於返回自己的家，並在「太小不宜婚」的幫助之下開了一家餐廳，並雇用其他倖存者

聞》(Detroit Free Press) 實習過。因為這些經驗，我一畢業就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找到工作。

英文扶輪月刊：報紙對你培養攝影技巧有何幫助？

辛克萊爾：我一開始是負責芝加哥郊區一些不太有趣的工作，像是拍攝當地的養蜂場，當時甚至都還不是蜜蜂季。最後，我慢慢晉升到主



2014年，非洲聯盟推動「終止非洲童婚運動」(Campaign to End Child Marriage in Africa)。辛克萊爾為參與這場運動的人拍照，包括（左上起，順時鐘方向）肯亞的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安喬琳·席帕羅 Angeline Yiamiton Siparo；兒童新娘提薩特·班達 Tisate Banda，背著她五個月大的女兒；世界年輕女性基督徒協會秘書長雅拉薩伊·古班凡達 Nyaradzayi Gumbonzvanda；坦尚尼亞兒童尊嚴論壇的阿米娜·阿里 Amina Alliy；肯亞桑布魯女孩基金會創辦人暨執行長喬瑟芬·韋利亞 Josephine Kulea；尚比亞的雷鬼樂手吉米·席姆科科 Jimmy Simukoko，藝名拉斯·吉米 Ras Jimmy



(上起，順時鐘方向) 在 2003 年巴格達的飯店爆炸案後，一名士兵在搜尋死傷者期間稍作休息；2005 年第 17 軍團第 1 步兵團在莫索爾西部協助一名受傷的男子；2004 年在民兵與美國士兵的武裝衝突後，巴格達一家醫院的太平間放著無人認領的屍體。

要新聞攝影師之一。2000 年時，我報導關於航空業的一個大新聞，獲得普立茲獎。

英文扶輪月刊：911 事件發生時，什麼因素驅使妳去拍攝？

辛克萊爾：我看到新聞，在進《芝加哥論壇

報》辦公室前就先打電話給我的編輯問說：「我能做什麼？」他們說：「打包行李，開車到紐約。」我不到一小時人就上車出發。後來成為歐巴馬總統專用攝影師的彼特·蘇薩 Pete Souza 當時也是本報派駐當地的團隊成員之一，所以我們一起合作；我的經驗比較少。我



上：獅子山國自由市的 17 歲貝比 Baby 與 48 歲的克羅德·賽布雷 Claude Seibureh 在伊波拉病毒危機時結婚；下：在阿富汗，11 歲的古蘭姆 Ghulam 本來夢想成為老師，可是當她與 40 歲的費茲 Faiz 訂婚後，被迫中輟學業。

負責那些努力尋找家人的民眾。我去拍麗莎·畢莫 Lisa Beamer，她的丈夫陶德·畢莫 Todd Beamer 在聯合航空 93 號班機上，並說：「咱們開始吧。」就在事件後幾天，我去他們在紐澤西州的住家。麗莎在那種情況下的堅強及冷靜，讓人進入她家，分享故事的勇氣，真的令我敬佩與動容。

英文扶輪月刊：突然間，感覺就像是天地變

色。妳報導 911 世界的經驗讓妳產生什麼改變？

辛克萊爾：我想要做得更多。我回到芝加哥，請報社派我到海外，讓我報導阿富汗戰爭。他們沒有立即派我到阿富汗，而是派我去報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然後在盟軍入侵前到伊拉克做報導。我在伊拉克待了 2 年，數度到阿富汗。有其他一些女性也報導這件事，但是我們顯然是少數。我們自成一個圈子。

我是一個戰爭攝影師，所以有時候我會置身險境，可是你會變得習以為常。而且身為記者，你知道你可以離開，而大多數生活在那樣情況下的人是走不了的。人們必須在混亂中設法過他們正常的生活。

英文扶輪月刊：什麼讓你對兒童新娘問題產生興趣？

辛克萊爾：我決定離開《芝加哥論壇報》，成為一位自由投稿記者，以便報導更多平民的故事。自 911 事件後，我對因可怕事情發生、生命幡然改變的人有很大的

興趣。在伊拉克，人們只是過著自己的生活，然後大軍入侵，他們的生活便連根拔起。我工作的其中一個主題是當許多事情失控但錯不在你，你要如何存活下去。

我認識第一批受到童婚影響的女孩是在阿富汗。我因《美麗佳人》(Marie Claire) 雜誌的工作去調查女孩自焚的現象。這些女孩有許多都是被迫在 9 到 11 歲之間就結婚。她們經歷

許多創傷及虐待，所以她們選擇終結自己的生命。她們會提出這樣的理由：「我泡的茶不夠熱，所以我放火燒自己」，可是那不是個理性的答案。那顯示她們感受到的恐懼。

英文扶輪月刊：那個故事的結局是什麼？

辛克萊爾：這些女孩的家庭允許我拍照是因為他們想要改變。那篇文章協助募集 2 萬美元來治療這些女孩的醫院，其他的募款讓這間醫院成為該國首要的燒燙傷治療中心。我深深明白童婚與女孩所面臨的大多數問題有關，包括缺乏教育；貧窮；割禮——這是婚禮的準備動作——以及這些婚姻本身，根本就是強迫勞動及奴役。當這些女孩很年輕就生育時，在分娩過程中死亡的機率就比較高。她們的子女也有比較高的風險會有腦性麻痺等問題，因為她們發生難產。我想如果我們能夠提高結婚的年齡，我們可以對所有問題發揮正面的影響。

英文扶輪月刊：這個目標成為妳的一項長期計畫。什麼促使妳成立妳的非營利組織「太小不宜婚」？

辛克萊爾：這個非營利組織大約是在 3 年前正式成立。可是它的起源是 2011 年《國家地理雜誌》所刊登一篇以此為標題的文章。之後我在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推行一項運動。我的母親在 2012 年往生，一位朋友的未婚夫也在利比亞身故。我們都在哀悼，想要做點正向的事，因此我們一起創立這個非營利組織。伴隨哀痛而來的有很多能量，我認為我們兩個都想要把那個能量轉化為正向的東西，創造出美麗的事物。

英文扶輪月刊：妳的非營利組織發揮何種效果？

辛克萊爾：我們看到一些人開始更認真看待兒童婚姻的問題，許多組織已經用我的照片來募款。我最近得知我一張照片催生了獅子山國一個數百萬美元的計畫。當妳報導重要但不受重視的社會議題時，這就是希望能達到的效果。

可是我發現分享這些故事的女孩往往並不是受益者。我想要確認我們能夠回饋她們及她們的社區，因為她們想要改變，也樂於改變，這是為何她們當初接受拍照的原因。

我們教導這些女孩照相，並提供獎學金。這讓我們得以不同的方式讓這個議題持續出現在新聞中，因為這些女孩可以用她們拍的照片來陳述自己的故事。這是我們記錄童婚問題所採取的全面性策略。重點不在於最初的記錄及報導；重點在後續所發生的事。

英文扶輪月刊：什麼促使妳對另外一個經常成為暴力及虐待目標的群體——白化症者——產生興趣？

辛克萊爾：我聽說過在坦尚尼亞白化症者容易受到攻擊。所以我到那裡去拍攝當地人。這篇報導出現在 2017 年 6 月的《國家地理雜誌》。

我和我丈夫布萊恩 Bryan 正在進行領養的程序，我們得知許多中國的白化症兒童因為好幾個理由而出養。白化症者往往伴隨失明，所以如果你們是種田的貧窮人家，有一個法定失明、無法站在太陽底下的孩子，那就會是個問題。此外，在 2016 年之前中國都推行一胎化政策。我們在 2017 年領養了兩個白化症兒童。小蓮 Lotus 今年 4 歲，小森 Forest 則是 8 歲。他們的英文名字都是從中文名字翻譯而來。

領養法定失明的兒童讓身為攝影記者的我忖度他們是否明白我的工作，可是他們能懂。

領養法定失明的兒童讓身為攝影記者的我忖度他們是否明白我的工作，可是他們能懂。他們把東西拿到很靠近臉時便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們喜歡拍照。今天早上下雪，我女兒要我替她拍一張雪的照片。



在坦尚尼亞，辛克萊爾拍攝白化症患者的照片，他們飽受暴力威脅，因為當地相信用他們皮膚及骨頭製成的藥水可以帶來好運。在卡班哥保護中心暨學校（Kabanga Protectorate Center and School，左起，順時鐘方向），這些女孩很安全，但是必須遠離自己的家；艾格妮斯·南賀拉 Agnes Namhela 替她兒子梅沙克 Meshack 洗澡；該中心近三分之一的收容者都是有白化症。

英文扶輪月刊：對於我們這種手機的業餘攝影師有何建議嗎？

辛克萊爾：手機容易使用又方便，可是從攝影品質的角度來看，它們就是不夠好。下載應用程式來取得原始照片，而不是經過手機處理、檔案大小經過壓縮的照片，它便很好用。我們用 Camera+，可是還有不同的應用程式可以讓你的照片更有景深。對於真的很重要的照片，務必要留存大檔案，這是好相機才做得到的。值得特別對待的照片就要這麼做。

此外，花點時間，靜待那個瞬間。一般來說，那能讓你的人像照片最有趣、最自然。我

認為人們對我的照片有所共鳴是同理心。我認為並不是某種高超的拍攝技巧。事實上我不是個非常講求技巧的攝影師，可是我擅長呈現別人的故事。當你在拍攝自己的人生，你就是在對自己的子女、孫子女講述你的故事。你應該認真看待。攝影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它讓你擁有的人生經驗。關於世界及人生，你無法奢求比這個更好的教育機會。

本文作者 Julie Bain 曾為《英文扶輪月刊》訪問攝影比賽的兩位前任評審：2017 年的史提夫·麥科里 Steve McCurry，及 2013 年的卡蘿·古茲 Carol Guzy。